

局外人的原型·容闳

观察并追随李鸿章的足迹，会找到他的老师曾国藩。追随曾国藩的足迹，又能找到另外一个人。虽然一个人不会完全是另一个人的复制品，但曾国藩的某一部分很像林则徐。在清廉、有能力、开明这几个方面，林则徐又像他的前辈。

但是，孙文是一个新的类型。虽然评价标准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论，至少从大的方向来看，我们找不到孙文像谁。他本身就是原型人物。

这样的原型人物产生于时代的变革期。大概也有很多人有原型的要素，却被埋没了。如果不给他们舞台，就没有显露原型的机会。变革期给了他们登上舞台的机会。

好也罢，坏也罢，这里提到的容闳，必须说他是个原型人物。

容闳 1828 年生于澳门附近的岛屿。说是岛屿，其实只不过是河流分开的三角洲。他的自传里记载的南坪村，在地图上看，和前山村隔河相望。葡萄牙人的居住区在澳门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清朝把前山作为军队的驻扎地，也就是边防部队。葡萄牙人把前山称为“卡萨布兰卡”，大概是因为地形相似。

鸦片战争爆发前，局势紧迫的阶段，林则徐曾加强了前山的驻防。

前山往北数十公里，有一个叫翠亨的村子。容闳诞生之后三十八年，孙文在此诞生。所以也可以说容闳和孙文是同乡。

1835 年，容闳满七岁，被父亲带去澳门，进入郭士立夫人的学

校。这所学校的全部学生不足二十人。教师除了郭士立夫人外，还有夫人的亲戚巴夏礼姐妹，全部都是女性。学生里也以女子居多。巴夏礼姐妹就是后来成为英国驻日公使的哈利·巴夏礼的姐姐们。

郭士立夫人的丈夫郭士立，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。他作为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，又和鸦片商人勾结。1832年，阿玛斯特爵士号以调查扩大鸦片贸易为目的北上，他也一同前往。他在报告中写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：

——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，都抵御不了（英国的）一艘战舰。

英国在决定是否出兵打鸦片战争时，主战派经常引用他的这句话。

鸦片战争期间，郭士立跟随军队，担任过舟山群岛的民政官。

1837年，容闳还在郭士立夫人的学校里学习。这一年，郭士立救下了七个漂流到澳门的日本人，并乘坐莫里森号将他们送回日本。送还日本人当然不是他的目的。他希望以这种友善的表示换取与日本通商。

日本此时仍是闭关锁国的状态。日本人即使是在海上遇难，一旦到了外国，也终生不许回国。所以幕府根本不认为送还国人是一种友善的表示。

莫里森号的船主是美国的奥利芬特商会。和日本通商的荷兰当然不希望出现竞争对手。荷兰通过长崎奉行，将莫里森号来日的消息告知了幕府。幕府决定如果莫里森号来日，就将它赶走。

——如此一来，只会降低日本在国际上的信用。

稍微了解世界形势的兰学家们忧心忡忡。渡边华山写了《慎机论》，高野长英写了《梦物语》，指责政府的方针。这后来发展成“蛮社冤案”。

“蛮社冤案”发生在1839年，莫里森号被赶走发生在1837年。他们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。高野长英在《梦物语》中把“莫里森”

当做一个人名。他大概把它当做了新教在中国传教的鼻祖巴特·莫里森。巴特·莫里森在 1834 年刚刚去世。

历史后来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。从一方面也能看出，当时东方对世界形式的判断是多么幼稚。

总之，容闳在澳门求学时，正是这样一个时代。

郭士立夫人的学校原本是为教育女子开创的。专门教育男子的学校在 1839 年才正式建立。那所学校为了纪念已故的罗伯特·马礼逊，取名为马礼逊纪念学校。容闳是这所学校的第一届学生。这是鸦片战争的前一年。时年二十九岁的耶鲁大学毕业生米歇尔·勃朗在马礼逊纪念学校任教，他后来去东京开创了明治学院。

勃朗在 1846 年回到美国，当时他带着三名优秀的学生，容闳就是其中之一。

鸦片战争结束后，香港割让给英国，马礼逊纪念学校也从狭小的澳门搬到了香港的高地上。

这样，容闳成了中国赴美留学第一人。

吉田松荫偷渡留学失败，是在八年后的 1854 年（嘉永七年）。这一年，留学美国的容闳已经从耶鲁大学毕业。他通过在学生宿舍、食堂和图书室等地方勤工俭学，完成了学业。

日本早期的欧美留学生，比如去荷兰的榎本武扬，去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闻多，他们或是倚靠幕府，或是倚靠毛利藩，都是有政府背景的公派留学生。

容闳没有政府背景，所以他必须打工。

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年，容闳回国了。虽然说是回国，但他在美国获得市民权，加入了美国国籍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回国。但从报效家乡这个意愿上说，也可以称作回国。他一定是怀着满腔抱负回去的。

——中国虽大，却没有比自己更了解世界形式的人。

他充满着自信。

不只是自信。他在美国住了将近十年。十年间耳濡目染，他了解了广阔的世界。在中国没有能和他比肩的“外国通”。

而且，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，被迫打开国门，没有比这个时代更加迫切地渴求外国的知识。像他这样的人物只要进入国家中枢，负责对外问题，就能充分运用他的知识。

容闳也一定是那样打算的。可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。他去美国的时候，背后没有国家的权威。他回来的时候，也和国家权威扯不上半点关系。

他回国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已经忘掉的汉语。不，或者说是开始学习。他七岁的时候就被送进“英语学校”，即使会说中文，也不能读，不能写。马礼逊纪念学校虽然开设中文的科目，也只是初级课程，搁下九年之后，基本上忘得差不多了。

会读会写之后，容闳必须要去找工作。然而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。

和榎本、伊藤、井上等日本初期的留学生相比就一目了然。他们几位谁会为了找工作四处奔走呢？

总之，容闳找了份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工作。

他又先后换了好几次工作。

最初他担任皮特·帕克的私人秘书。帕克是一位传教士，也是一位医生，后来热衷于政治。他曾提议美国占领台湾。容闳担任秘书的时候，也是他开始热衷于政治的阶段。

容闳希望通过帕克认识一些中国的要人，不久知道不太可能。因为从帕克身上也学不到什么东西，他又做了香港高等法院的口头翻译。这次他被英国人律师抵制。因为容闳不光做翻译，也开始做见习律师。英国人担心，如果出现一位精通中英两国语言的律师，英国人就不能垄断律师行业了。后来容闳又到新开辟的港口上海，在外国人管理下的海关工作。可是这里的规矩是勒索中国船主，容闳又愤而辞职。

再后来他到经营茶叶和生丝的英国商社工作。这次倒不是因为他的缘故，而是经营不善，公司倒闭了。容闳再一次失业。

失业的时候，朋友曾介绍他担任英国丹特商会的驻长崎买办。但是他拒绝了。

——我是美国第一流的耶鲁大学的毕业生。如果知道我做买办，母校的人和我的同学会怎么想？我不能损害母校的名誉。

后世的史家曾称容闳是“买办改良主义者”。其实他是看不起买办这种职业的。长崎当时是新开放的港口，在长崎做一个买办肯定收入不菲，然而容闳更重视名誉。一个三十出头、意气风发的一流大学毕业生的形象栩栩如生。

——与其被商社雇佣，我更想做和商会老板平等的工作。

这是他的希望。

因此，他收购茶叶，转卖给外国商社。

他也做过收购业务的代理人。因为这份工作，他周游了全中国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他的自传里详细地记载了他到湖南湘潭收购茶叶的经历。湘潭是毛主席的故乡。当时是1859年，毛主席当然还没出生。

——工作不只是谋生的手段，更是完成我中国改良之计划所必需。

生于广东沿海贫穷农村的容闳，之所以怀有改良中国的抱负，当然是因为到了美国后看到了先进的文明。

1850年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。三年之后，太平军占领南京。容闳回国之时，曾国藩正组织湘军讨伐太平军，太平天国内部也出现了内讧。他回国的第二年（1856年），杨秀清被杀死。即使如此，可以说还是太平天国的全盛期。

容闳在美国成为了基督徒，所以对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天国很有兴趣。

太平天国之人拒绝满族的辫子，留长发，因而被清朝视为长发

贼或长毛贼。他们造反之初是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，首领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，主要成员也多是广东、广西出身，也被称为粤匪。粤是那一带的别名。

容闳也是广东人，所以对太平天国大概也有一层同乡间的亲切之感。

他在自传里写道，刚刚回国的時候，两广总督（广东、广西）叶名琛曾处死了七万五千名逆匪，这给了他很大的打击。和太平天国关系密切的真正的“逆匪”，多数都去了南京了。在广东周边抓捕的多是没有罪的人。叶名琛是湖北汉阳人。广东人组成的太平天国军队在自己的老家杀了很多，作为报复，他杀了许多没有罪的广东人。至少容闳是这么想的，在自传里是这样写的。

回国初期，容闳寄居在传教士布鲁曼家里。那里靠近刑场，容闳亲眼看到了累累的尸山血海。

——这算怎么一回事？太平天国要推翻清朝，看来是理所当然的。

他从刑场回来之后，筋疲力尽，没有食欲，整夜睡不着觉。这时，他开始认真思考，积极地加入到太平天国的阵营中。

但在当时，他还没有重新掌握汉语。容闳一边学习会话和读书，一边为挣生活费奔波。

1860年（他的自传里写的是1859年，应是记忆有误），他和两位传教士一起，终于访问了太平天国。

他在南京见到了洪仁玕。洪仁玕是洪秀全的亲戚，在香港住过很长时间，和容闳在香港见过面。现在他是太平天国的首脑人物，被封为干王。

容闳对洪仁玕说：

——我还没有考虑要加入太平天国。现在只是向你们表示敬意，希望知道南京的真实状况。

大概是目睹了广东刑场上辛酸的一幕，容闳内心的火焰凉了半

截；或许他收购茶叶和生丝很挣钱，当时没有停止的打算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建议：建立陆海军学校、组建近代军队、让有才能且富有经验的人组建文明政府、设立银行、开展国民教育、建立工业技术学校等等。

他说：

——如果这些建议能被采用，我很乐意帮忙筹集资源。

容闳完全没打算成为政府官员、银行经理或大学校长。因为以他的性格来说，从现实层面就不能加入太平天国。而筹集资源是商业行为。在这个层面的接触，容闳是很乐意去做的。

他在自传里没有明确记载，但这次访问很可能还有一些具体的“商谈”。这之后，他在太平天国支配下的地域收购茶叶。自传里写过，容闳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的茶园里运出库存的普洱茶。这难道不是事先和太平天国的领导层打过招呼吗？甚至我还怀疑，可能库存茶叶一事，就是太平天国透露给他的。

——我确信，中国的革新和更生，都不能指望太平天国。

容闳虽然这么说过。但是要考虑到他的自传是在太平天国覆灭后写的，他的这种确信程度需要大打折扣。

1864年，太平天国的天京（南京）陷落，十多年的动乱打上了休止符。而在这一年前，容闳被清政府的领袖曾国藩叫去了。

一开始，容闳以为是他访问太平天国，并在那里收购茶叶的事情暴露了，清政府要审问并斩首他。于是他以“眼下商务繁忙，容闳闲暇时再去谒见”的理由敷衍过去了。之后他多方打听，发现不是什么坏事，才去了安庆的曾国藩府邸。

容闳一直盼望能认识高级官员，这一天终于实现了。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，单靠一己之力是不可能的，必须通过“要人”的提携。

当时，作为一个在美国居住了近十年的中国人，不论是怎样的一个平凡人物，都痛感祖国必须进行西欧式近代化改革，希望为祖国尽一份力。这一点想必大家都能理解。

然而，一旦回国，就很少有人还觉得有近代化的必要。或者说几乎没有。一般的人就不用说了，身居要职的大官一般也没有这个意识。

鸦片战争中的惨痛教训，难道还不足以唤醒他们吗？

容闳非常焦急。

这个时候，容闳遇见了一个人，他注意到技术上的近代化需要。这个人就是和太平军恶战后获胜的曾国藩。

现在，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留美第一人的容闳和日本留学生之间的不同。

伊藤博文、井上闻多等人，回国之后就被全国上下风起云涌的“近代化”热潮捧上天了。

日本举国都向文明开化狂奔，迎接他们的是这种热情。他们在外国的经历很快就被民众吸收了。他们都感叹要是再多带回来一点儿就好了。

那么，容闳是怎么样呢？

根本没有近代化的热潮。发烧的只是他自己。周围冷冰冰的，他好像冻土荒原上的保温瓶一样，无计可施。

没有人想要从他身上学些什么。而他明明学了一身有用的本事。——英雄无用武之地。

他经常这样自我叹息。

和理解近代化的曾国藩相遇，简直就是久旱逢甘霖。不，应该是蓄满流水的大坝打开了闸门。

但是，他和曾国藩之间还有很大的分歧。

曾国藩高度评价外国的“技术”，但是对其“精神”却漠不关心。他相信中国的精神是最优秀的，普天之下无出其右。这种中华正统思想，不光在曾国藩身上，甚至是具有良好教养的士大夫阶层的共识。

在日本，这种想法被称为“和魂洋才”，在中国叫做“中体西

用”。

——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。

这句话出现在三十多年之后的孙家鼐的奏文里。此话一出，西洋文明的优势只在技术这种观点，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如果不这样，那丫丫学语时跟父亲和老师学习的四书五经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除此之外还有精神吗？

传统的知识分子自然怀抱着这种信念。

但是容闳从七岁起就进入郭士立夫人的学校。

他无缘于“人之初、性本善、性相近、习相远”的《三字经》。

在古代中国，学问就是四书五经，入门的基础就是《三字经》，读书人一定都能背诵。

可是，容闳用 ABC 代替了《三字经》，更不用说学四书五经了。然后他在美国住了近十年。

他绝不会认为“西洋没有精神”。

甚至他会认为，只有在西方的精神土壤下，才会盛开西方科技的花朵。

因此，容闳最关心的是西式的教育事业。他在自传里也经常提到念念不忘的教育事业，他说做买卖挣钱也是为了办教育。自传里也许是在为自己辩护，但他把眼光放到了教育上，绝不是一个“中体西用”论者。

曾国藩是典型的“中体西用”论者。所以他相信最重要的是：

——机械工场。

容闳和曾国藩见面以前，已经从他的幕僚那里知道了曾国藩的想法。

容闳事先知道，曾国藩要建造机械工厂，因此才把自己叫来商谈。

——现在中国最需要做什么？

对于曾国藩这个问题，容闳非常想回答“教育事业”。他忍住

了。介绍自己来的朋友说过，必须迎合这位总督的想法。于是容闳回答：

——建造机械工厂。

这个时候，他作为商人的胆小怕事完全暴露出来了。

这样，他被委以购买机械的任务，再次来到美国。购买机械的资金是八万六千两白银。

曾国藩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：

——与李壬叔、容纯甫坐谈颇久。容，名光照，一名宏，广东人，熟悉外洋事务。曾寓居花旗国八年。余请之赴外洋购买制品。

“宏”就是容闳。花旗国指美国，因为国旗花花绿绿而得名。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美国鲱鱼被称为花旗鲱的缘故。

容闳结束任务回国，用了将近两年时间。去的时候是绕过美洲大陆的南端，回来的时候横渡太平洋，他希望环游世界一周。

当时美国正在南北战争的最高峰，加入美国国籍的容闳，曾申请做六个月的短期志愿兵，然而志愿兵管理局局长这样拒绝了：

——您最好完成中国政府委托的任务，我们的兵力很充足。

他滞留美国期间，正好赶上耶鲁大学的毕业十周年纪念，他见到了久未相见的老同学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。

因为从旧金山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航线，他先乘坐去横滨的小帆船，在横滨换乘“帕斯菲克·安德”东方商社的开往上海的蒸汽船。

日本当时是明治维新前的庆应元年。在澳门郭士立夫人学校教过容闳的巴夏礼姐妹的弟弟，哈里·巴夏礼赴任英国驻日本公使是在这一年的五月。按照曾国藩的奏文，容闳是在十月份回的国。容闳恐怕当时并不知道，因而没有和英国公使见面。如果见面了的话，自传里应该有所记载。自传里也没有对横滨的印象。也许是马上就找到了换乘船，没有时间慢慢地参观。

容闳回国后知道，太平天国叛乱已经在一年前被剿灭。曾国藩为了讨伐安徽北部新近造反的“捻匪”，正驻扎在徐州。曾国藩第二

年把这个职位交给了李鸿章，所以容闳一到上海，马上就奔赴徐州。

容闳购买的机械放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，厂址借用美国亨特商会的工厂。

两年后，天津和金陵（南京）建造机器局，接着福州、山东、湖南、四川、广东、吉林、山西、浙江、台湾、云南相继设立制造局。湖北建立了专门制造武器的工场，称为“枪炮厂”。

这样，中国迎来了洋务运动的时代。三十年之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中，洋务派蒙受痛击，逐渐转变成“变法”这种白热化的形式。

容闳念念不忘的，仍是他的教育事业。购买机器，建造机器局（工厂），都不是他擅长的领域。

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他当年在耶鲁大学攻读的是什么专业。但从他回国后从事律师，以及自传里提到的没有拿到微积分的学分来看，可以推定他是文科生。

他向前来视察江南制造局的曾国藩建议开设职工学校，两年之后才被批准。

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，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得意。

他之后热衷于介绍中国青年去美国留学。他的最高目标，是让中国变成一个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国家。

曾国藩和李鸿章二人共同上奏，确定每年派三十人赴美留学，为期十五年。因为留学期限很长，被推荐者的年龄严格限定在十二岁到十六岁之间。

派留学生去美国，受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。这些少年虽然是去美国学技术，为了不违反“中体西用”的大原则，还派了两位教授中国古典的学者。

热衷于此项事业的容闳，只被授予留学生的副监督。正监督是陈兰彬，是一个进士出身的顽固的守旧派。

容闳购买机械的时候，被授予相当于五品的官职。回国后的待遇相当于盐运司运同，这是从四品的官。按照官职来说，授予留学

生副监督是不恰当的。

但这绝不是不当的人事安排。陈兰彬不过是正六品的主事，却是正儿八经的进士。在官场上，可以说不是进士就不是人。

容闳虽然被曾国藩授予“相当的位置”，但总督的授权只在战争这种非常时期才有效。也就是说容闳是趁乱挤进官场的。

在当时的中国，进士以外的人成为高官的情况属于特例。在同一时代，大概只有左宗棠。稍稍往后数的话，袁世凯也是一个。但袁世凯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军阀时代了。况且左宗棠是举人，袁世凯接受过古典教育，容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了。

容闳进入郭士立夫人的学校的时候，就被打上了“局外人”的烙印。

像这样的“局外人”，单靠自己的力量什么也做不了。至少在官场上是如此。他购买机器，办制造局，创办学校，都是借曾国藩之力。

赴美留学生也只办了四年就停止了。每年三十人，四年就是一百二十人去了美国。留学十五年的远大计划，也因为本国发出送还留学生的命令而搁浅。

这里面有留学生负责人之间的内讧，传统的士大夫和容闳这样的局外人之间的分歧也是一个原因。

“中体西用”派的观点，概括起来说，就是富国强兵。“富国”就是做买卖，用不着向美国学习。只有“强兵”是他们所期待的。

最初支持派遣留学生的李鸿章，希望把留学生送入士官学校或军校里，让他们成为“强兵”的领导。但是美国当局不同意军校接受中国人入学。得知此事后，李鸿章对派遣留学生失去了热情。

容闳再次受了挫折，此后又挫折重重。

中日甲午战争之时，他为了募集外债到了伦敦，却因为担保问题没有办成。他曾向张之洞建议，但是被张之洞的政敌李鸿章阻挠。

中日甲午战争时，他曾建议以台湾为抵押借四亿美元，充作军

费。这最终也没能实行。

然后他又建议开设国有银行，这又被大政治商人盛宣怀排挤；他又计划修建北京和镇江之间的铁路，因为德国政府的反对而没能实现。

他能做的只有“建议”。向曾国藩建议，向张之洞建议，设立国有银行的时候，又打算借助张荫桓的力量。

封建中国的规矩是只有精英才有权力办大事。一个没有资历的人，甚至从一开始就不在正统轨道上的容闳，只有采取求助他人的买办式的方法。

不是进士出身，要想办大事，难道只有买办式的方法吗？

实际上，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打碎整个基础。容闳的同乡孙文，也没有传统读书人的经历，他勇敢地做了。

但是，若是指望容闳走上孙文的道路，实在太强人所难。在他的脑中连革命的碎片都没有。容闳观察太平天国后分析，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贫民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丧失了宗教上的信仰。而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，不是底层的贫民，而是一部分上层的堕落。容闳不能正确评价人民的力量，盼望他去革命是行不通的。

再以后，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样本，以立宪新政为目标，向西太后发起政变拥立光绪皇帝的“戊戌政变”，由于袁世凯的背叛而失败了。

不知道容闳和这次政变有没有关系。总之，清政府发出了逮捕令。他从北京逃走，躲进了上海的租界，之后又移居香港，1911年死在美国。这一年辛亥革命成功，清政府被推翻了。

香港大学的罗香林教授认为容闳是戊戌变法的支柱。果真如此吗？容闳确实和康有为、梁启超关系密切，但他在自传里写过：

——康、梁筹划维新事业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。

戊戌年，容闳已经七十岁了。康有为也许把他当做年长的前辈，向他表示敬意，询问一下他的意见。但绝不会邀请他参加政变。

至于后来他担任上海国民总会的会长，1902年洪金福、李纪堂起兵时拟任他为“大总统”，恐怕也不过是出于敬老的精神。我无法想象他会积极地参与这些事。

容闳的悲剧，与其说是中国的近代化热潮没有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炽热，不如说是他的思想里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民的力量。当然，他自己也没有认识到这种悲剧。

研究东亚的近代化，容闳是一把大号的钥匙。作为一个原型人物，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他。以他为原型的一系列人物，不仅在中国，在亚洲各国的近代史上都纷纷登场。